

# 傳播·出版·行銷： 以「南宋詞選」爲中心之文化探究

李德偉\*

## 【提要】

本文將「南宋詞選」置於傳播的脈絡下重新思考，詮解當時南宋之文學生態與文化內涵。首先，以「文學商品化」與「消費對象的轉移」二點來論述南宋詞選傳播之背景。其次，分別以「出版文化」、「文學生態」二點來論述與南宋詞選之間的關係。南宋詞選與出版文化方面，以「出版商與贊助者」、「行銷策略與讀者意識」二點爲討論焦點，詮解評論者、讀者與文本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而觀察南宋文學的消費傾向。南宋詞選與文學生態方面，以「文學社群之推動」與「江山易主之文化衝擊」二點爲論述對象，進而建構出南宋時期的文學生態版圖。最後，則總結南宋詞選之文化意涵。

**關鍵詞：**南宋詞選 文學傳播 詞學批評 文學社群 出版文化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一、前言

文學與文化的關係往往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依存狀態，文學表現是文化活動之一，必然接受文化之制約。就詞而言，本是一種歌唱文學，為歌舞昇平時供娛賓遣興所用，必待太平歲月方能有所發展。宋朝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在此時代環境下，詞的創作日益豐富；加上朝廷御宴、官府公筵，下自富家宴飲、縉紳聚會，詞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誠如韋勒克（Rene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在《文學論》中指出：「文學本身便是社會的一份子，也具有一種特定的社會地位，那就是說他接受某種程度的社會默許和報酬。文學的興起經常是和特定的社會行為有密切的關係。」<sup>①</sup>因此，就文學而言，不僅是人生的反映，同時也蘊含了時代的社會文化；這種社會文化不僅影響了宋詞的創作，同時也對宋代詞學批評產生了作用。

宋代以來，商業發達，圖書普及，大眾文化蓬勃發展，引起一連串文學生態的變化，「文學傳播」、「讀者接受」、「文學與文化」等論題成為重要的論題。就宋代詞學批評而言，結合「文本」與「文化」的探討乃是刻不容緩之事；拓展宋代詞學文化背景研究的視野，仍然是當務之急。據此，吳熊和曾指出：「宋詞的發展不單是一種文學現象，而是受到諸如燕樂風行、社交方式、歌妓制度和社會風氣等影響之文化現象。」<sup>②</sup>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中亦結合唐宋詞與社會文化學為探討<sup>③</sup>。由此看來，著重詞學文化背景的探討，已逐漸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sup>④</sup>。

除了以文化背景來探討唐宋詞之外，近幾年來，唐宋詞的傳播論題乃是詞學研究者另一個關注的問題。首先，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理論傳入中文學界，引發了學者的高度關注，近來出現了不少以接受美學理論

① 韋勒克（Rene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合著，王夢鷗、許國橫譯，《文學論》（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頁149。

②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66。

③ 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④ 此類相關的論述，可參見沈家莊，《宋詞的文化定位》（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蔡鎮楚，《宋詞文化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蔡鎮楚，《唐宋詩詞文化解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李劍亮，《唐宋詞與唐宋歌妓制度修訂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劉尊明，《唐五代詞的文化觀照》（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詮釋中國文學的專著<sup>⑤</sup>。此外，劉尊明於《唐宋詞綜論》中，則就溫庭筠、周邦彥與李清照三人詞作傳播的情形，進行探究<sup>⑥</sup>。王兆鵬〈歌妓唱詞及其影響——宋詞的口頭傳播方式研究〉中指出，宋代歌妓的職業化與專業化、演唱的環境、唱詞的選擇與演唱方式，對宋詞的傳播有重要影響<sup>⑦</sup>。李劍亮提出唐宋詞傳播的面向可分為「靜態傳播」與「動態傳播」二方面<sup>⑧</sup>。其它如黃文吉、楊雨等人亦有相關著作<sup>⑨</sup>。綜觀上述的研究，主要圍繞在歌妓制度對於詞作傳播的影響，或者是個別詩人作品、詞家詞作的傳播與影響上，對於詞選傳播的問題及其文化意涵則甚少論及，因此有進一步探論的必要。

詞選除了作為詞學批評的一環，它更是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正如同戈德曼所言：「作品世界的結構乃是與特定社會群體的心理元素結構相通，或至少有明顯的關聯」<sup>⑩</sup>，因此，藉由詞選批評策略的詮釋，自可映現出當時的文學品味、文學生態及文化意義。現今學界關於宋代詞選的研究，主要的專著有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探討宋代詞選集的編選內容、標準與目的，並就宋代詞選對於明清詞壇的影響進行論述<sup>⑪</sup>。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研究方法與劉少雄大抵相同，只是蒐羅範圍更廣，包括《花間集》、《雲謠集》及《中州樂府》等書<sup>⑫</sup>。此外，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則將宋代詞選分為歌妓唱本、詞人選詞、書坊選詞、詞社選詞四種類型，並論述其批評策略<sup>⑬</sup>；也有以個別宋詞選本為主題，進

⑤ 如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陳文忠，《文學美學與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尚學鋒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0年）。劉學鐸，《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彰師大國文學誌》第3期（1999年），頁329-427。東華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

⑥ 劉尊明，《唐宋詞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51-313。

⑦ 王兆鵬，〈歌妓唱詞及其影響——宋詞的口頭傳播方式研究〉，東華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頁311-345。

⑧ 李劍亮，《唐宋詞與唐宋歌妓制度修訂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⑨ 黃文吉，〈宋代歌妓繁盛對詞體之影響〉，收於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一屆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頁209-235。楊雨，〈略論歌妓文化與詞的興起和傳播〉，收入《詞學》第1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1-43。

⑩ 戈德曼著，吳岳添譯，《論小說的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226。

⑪ 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⑫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⑬ 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批評形式與文化詮釋》（暨南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71-100。

行論述<sup>14</sup>；其他如任二北〈研究詞集之方法〉<sup>15</sup>，舍之〈歷代詞選集敘錄〉<sup>16</sup>均對唐宋詞選存書的狀況進行分析。

本文以「南宋詞選」之文化意涵作為探討對象，在上述的研究成果中，尚未獲得深入的研究。上述的詞選研究，只是詳盡地介紹選本個別刊刻的情形，或者僅略述宋代詞選的文化意涵，且並未將選本置於「文學傳播」的動態歷程中，去探究它的文化意義；另外，這些詞選本在宋代的傳播狀況與影響效力，也正是本論題所欲進一步探討者。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改弦易轍，轉從「商業行銷」、「出版機制」、「文學傳播」與「文學生態」的角度作探討，輔以詞話、筆記之詞學資料，交相論證以發明宋代詞學，為「南宋詞選」之文化意涵提供另一種詮釋，並觀察此一時代的文學消費傾向，進而建構出南宋時期的文學生態版圖。期盼透過本文的探討，能夠觀照「南宋詞選」的另個面向，開展出一條嶄新的研究路徑；也為舊有的詞學材料尋找並提供新的詮釋途徑。

再者，關於本文文本擇取的方法上，南宋以前，較少有詞集之刊刻。關於南宋編選多人詞作而成的詞選本甚多，流傳至今，尚見完整者有《梅苑》、《樂府雅詞》、《草堂詩餘》、《花庵詞選》、《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樂府補題》、《名儒草堂詩餘》。根據蕭鵬的研究指出，詞選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概念：狹義之詞選，乃是編選者為若干詞人的部分作品，按照一定的取捨標準或角度進行以選擇的輯錄，並依據某種體例編排成帙。廣義之詞選，則是編選者對若干詞人的作品部分地加以輯錄，並依據某種體例編排成帙<sup>17</sup>。本文對於「南宋詞選」的義界，則是採用「廣義之詞選」。然而，礙於篇幅之故，《梅苑》、《樂府雅詞》與《陽春白雪》三部詞選集將另撰他文討論。本文將聚焦探討《草堂詩餘》、《花庵詞選》、《絕妙好詞》與《樂府補題》四部詞選與傳播的關係。至於《名儒草堂詩餘》，選有元人與元詞，屬於另個範疇，暫不討論，他日再議。以下，本文

<sup>14</sup> 劉少雄，〈草堂詩餘的版本、性質與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第5輯（1991年），頁215-236。蕭鵬，〈趙聞禮陽春白雪版本考述〉，《文學遺產》第1期（1991年），頁127-129。孫克強，〈《草堂詩餘》在詞學批評史上的影響與意義〉、〈《草堂詩餘》的盛衰和清初詞風的轉變〉二文收於《詞學論考》（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1-44、110-126。

<sup>15</sup> 任二北，〈研究詞集之方法〉，《東方雜誌》第25卷9號（1928年），頁49-61。

<sup>16</sup> 舍之，〈歷代詞選集敘錄〉，《詞學》第2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226-240。

<sup>17</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1。

即依據上述的南宋詞選本與觀察視角展開論述。

## 二、商業與消費：南宋詞選傳播之背景

宋代以來，商業化的社會乃是促進宋詞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不論是歌妓唱詞，詞選的出版，都脫離不了文學傳播的因素。以下分別就「文學商品化」與「消費對象的轉移」二方面來說明南宋詞學之傳播概況。

### （一）文學商品化

當印刷術在宋代蓬勃發展之後，書籍的傳播情形產生了空前的變化。雕版印刷，印刷術的普遍應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sup>18</sup>。從前需要耗時手抄的書籍，如今卻可輕易購得，於是書籍不再只是記載的工具，而轉變成傳播的工具<sup>19</sup>。不僅圖書大量生產，成本降低；而且品質精良，前所未見，當時除朝廷訪求書籍外，民間士人獻書踴躍也是常見的景象。《宋史》〈藝文志〉載：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經仁宗、英宗兩朝（1023-1067），至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1068-1126），一百六十七年間，中央官府藏書已多達 6705 部 73877 卷，成長數量為五倍有餘<sup>20</sup>。張高評曾言：「寫本典藏、雕版刊行、圖書流通、知識傳播、閱讀接受，五者循環無端，傳播與接受交相反饋，遂形成宋代文化之網絡系統<sup>21</sup>。由此觀之，宋代印刷文化事業興盛，與商品經濟相互結合，兩者相輔相成，成就一件劃時代的事蹟，也間接造就兩宋之文化高峰。

書籍量產之後，它不再是少數人的專業用品，變成是可以企業化經營的商品。於是從編輯、印刷、行銷等一貫作業，造就了南宋民間「書坊」大量的出現<sup>22</sup>，得以大規模的印書、出書，促使民間書坊數量大增；另一方面，

<sup>18</sup>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56-358。

<sup>19</sup> 周彥文，〈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文學與傳播的關係》（臺北：學生書局，1995年），頁25。

<sup>20</sup> 元·脫脫，〈藝文志一〉，《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202，頁5033。

<sup>21</sup> 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頁193-194。

<sup>22</sup> 根據周彥文先生考證，光是南宋，以刻書賣書為業，有名可知的坊肆，至少就有三十多家。周彥文，〈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文學與傳播的關係》，頁26-28。

這對詩詞文集的保存，也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在此情況下，文人雅士的詩文集在市場上販售，往往「詩詞一出，人爭傳之」<sup>23</sup>，曾慥〈東坡詞拾遺跋語〉中指出：「東坡先生長短句既鏤板，復得張賓老所編，并載於蜀本者悉收之。江山秀麗之句，樽俎戲劇之詞，搜羅幾盡矣。傳之無窮，想像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sup>24</sup>可見當時詩文傳播之迅速，永恆流傳，行之久遠，乃是其預期目標，這一切都歸功於民間書坊的發展。此時文學與書籍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化交流，書籍與文學逐漸變成一種消費，微妙地結合商業，成爲一種時尚的商品。

除了印刷術的發展與民間書坊的出現外，南宋另一個造成文學商品化的背景乃是「干謁行卷」的方式。干謁權貴，歌頌昇平，以詞謀資爲利，正是南宋詞世俗化的一面。「干謁行卷」爲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詞人投以自己的詞作，敦請當時或社會文學聲望較高之人爲之爲序題詞，以增加個人的文學聲望，或者是經濟來源。宋代文人行謁的方式，根據《瀛奎律髓》中評戴復古〈寄尋梅〉所言：「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sup>25</sup>意指投以個人之著作，以謀求位高權重者予以介紹，如史達祖請張鑑爲其詞卷爲序<sup>26</sup>，即是最佳之例證；又如劉克莊，當時於文壇頗具盛名，精擅詩詞，前來請求爲之題序歌頌之人不在少數。劉克莊曾言：「余少嗜章句，格調卑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爲。然江湖社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難屏居田里，載贄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閱。」<sup>27</sup>「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閱」，當時南宋干謁風氣之盛，由此可見一番。文學創作由原本單純的抒情寫意，轉而變成個人競爭聲名、賴以生存的謀利工具，正如同康來新先生所言，宋人印刷事業與讀書風氣相互激發，閱讀成了「專業學問」與「商品銷售」<sup>28</sup>。文學變成一種商品，此乃南宋當時文人圈中一種特殊的

<sup>23</sup> 惠洪，〈冷齋夜話〉，《四部分類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卷10，頁1020。

<sup>24</sup> 曾慥，〈東坡詞拾遺跋語〉，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30。

<sup>25</sup> 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3361。

<sup>26</sup> 「一日聞剝啄聲。園丁持謁入，視之，汴人史生邦卿也。迎坐竹蔭下，鬱然而秀整。俄起謂余曰：『某自冠時，聞約齋之號，今亦既有年矣，君自益湮晦達，某以是來見，無他求。』袖出詞一編，余驚，笑而不答。生去，始取讀之，大凡如行帝苑仙籟，輝筆絢麗，欣眇駭接。因掩卷而嘆曰：有是哉！能事之無遺恨也。」張鑑，〈梅溪詞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238。

<sup>27</sup> 劉克莊，〈送謝倅序〉，《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96，頁2946。

<sup>28</sup>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頁160。

文化標誌。

## (二) 消費對象的轉移

詞源於民間，興起於唐、五代，本是一種歌唱文學，填完詞後要靠歌聲來傳播，因此，歌妓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歐陽炯〈花間集序〉即言：「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sup>29</sup>至宋代，政治承平，經濟富庶，在城市快速發展之下，詞成為當時最興盛之文體。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國初平一字內，法度禮樂，寢復全盛。」<sup>30</sup>宋代經濟繁榮，歌妓文化極為發展，誠如孟元老所言：「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sup>31</sup>在宋代，歌妓佐歡勸酒極為普遍，周密《武林舊事》中有詳實的記載<sup>32</sup>，歌妓、文人，與詞的傳播與發展乃是密不可分。歌舞唱曲本是歌妓生存之本，而代表宋代文化之詞，經由歌妓而得到廣泛的傳播，同時又成為其吐露心聲的記錄，不僅映現出豐富的時代變遷，也是宋詞得以滋長、繁榮的土壤。

現存最早的詞選是五代人所編的《花間集》，歐陽炯於〈花間集序〉云：「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以陽春之甲。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sup>33</sup>從中可見，《花間集》選本顯然為應歌之作，為文人貴客宴飲聚會時供歌妓佐歡的唱本，娛賓遣興為其主要之用。北宋詞集的編選，仍然延伸《花間》詞編選的傳統，朱孝臧〈金奩集跋〉云：「蓋宋人雜取《花間集》中溫韋諸家詞，各分宮調以供歌唱，其意欲為《尊前》之續，故〈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sup>34</sup>由此看來，《尊前集》、《金奩集》等詞集，皆是以應歌而選的唱本。根據蕭鵬指出：南宋以前，《蘭畹曲會》是現存資料最早的詞

<sup>29</sup> 歐陽炯，〈花間集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39。

<sup>30</sup> 王灼，《碧雞漫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82。

<sup>31</sup> 孟元老，《東京孟華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2。

<sup>32</sup> 周密，《武林舊事》卷六中記載南宋歌妓「莫不靚粧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195地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827。

<sup>33</sup> 歐陽炯，〈花間集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39。

<sup>34</sup> 朱孝臧，〈金奩集跋〉，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6-7。

人選詞<sup>35</sup>，此書在宋代詞選集中有其重要意義，顯示詞選已逐漸擺脫作為唱本，以供酬酢宴飲之用的模式，同時也開啓文人選詞之風。

南宋以後，詞選逐漸轉為讀本，龍沐勛指出：「南宋以前詞，既以應歌為主，故其批評選錄標準，一以聲情並茂為歸，而尤側重音律。<sup>36</sup>」選詞的工作主要是樂工與說唱藝人，接受對象可以是一般市井小民，也可以是文人雅士；一旦宋詞變成書面傳播，脫離應歌而作的選詞階段，文人雅士成為特定的接受者，開啓了宋人詞選的另一個新境界。

南宋以來，隨著詞作消費對象的轉移，選詞型態已逐漸轉變，走向南宋詞壇「尚雅」的文學觀念。黃大輿《梅苑》中，編選人以《詩》、《騷》的傳統自許，托物言志，並提高詞作的文學地位，誠如其言：「於是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以為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托物取興。屈原制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聊書卷目，以貽好事云。<sup>37</sup>」此一編選企圖，契合當時南宋文壇的「復雅」取向<sup>38</sup>，南宋以來，詞體「雅化」的要求，乃是抵擋不住的文化現象；又如曾慥《樂府雅詞引》中所言，「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sup>39</sup>，直接言明選詞的策略，南宋文人對文學尚雅的要求，成為當時詞選集的重要理念。另一個更完整的網絡，沈義父《樂府指迷》中言：「下字欲其雅，不雅近乎纏令之體」<sup>40</sup>；張炎、王沂孫、周密，陳允平及《樂府補題》唱和諸友等，諸家多精通音律，以雅為尚<sup>41</sup>。楊纘《作詞五要》、楊纘《紫霞洞譜》與《圈法美成詞》，以上諸作，系統似有參差，然就文學創作與批評而言，其一致也，皆為南宋文人倡導雅化之作。不外乎：講究篇章字句之鋪排，要求音律之和雅，重視詞之音樂性與文字美，樹立詞為雅正之文體。

<sup>35</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27。

<sup>36</sup> 龍沐勛，《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1。

<sup>37</sup> 黃大輿，《梅苑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55。

<sup>38</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43-48。

<sup>39</sup> 「所藏名公長短句，哀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於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豔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凡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闕，平日膾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於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溫陵曾慥引。」曾慥，《樂府雅詞引》，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52。

<sup>40</sup> 沈義父，《樂府指迷》，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277。

<sup>41</sup> 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88-101。



### 三、南宋詞選與出版文化

南宋以來，書籍量產之後，造成了文學生態的改變。「詞選」與出版文化之間往往涉及許多傳播與行銷的問題，逐漸改變了「詞選」傳統的文學批評意義。以下分別就「出版商與贊助者」，「行銷策略與讀者意識」二方面來說明南宋詞選與出版文化之間的關係。

#### (一) 出版商與贊助者

古代文人詩文集多是身歿後，由後人集結而成之，然自曹植始有自編文集的記載<sup>42</sup>。南宋以來，印刷術的發達，書肆林立，書價下跌，影響所及，書籍漸漸從具有文獻保存之意義，微妙地滲入商業傳播色彩，進一步在群眾中流傳。晁謙之〈花間集跋〉中就有針對出版詞集的記載：「《花間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長短句……建康舊有本，比得往年例卷，猶載郡將監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錄與《花間集》之贖。又他處本皆訛舛，乃是正而復刊，聊以存舊事云。<sup>43</sup>」宋代當時不僅已有詞集印行的情況外，甚至連詞人之作也能單篇成印，以達迅速而廣泛的傳播效果。此外，宋人對於版本問題也極為重視，如葉恭綽即指出宋刊《淮海詞》版本有三種之多<sup>44</sup>，可見宋人印刷發達，民間取得書籍已不是困難之事，所謂「今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sup>45</sup>」，即是最佳的說明。

雖然宋代以來，刻書成本已較之前低廉，但對專業文化人而言，出版仍非簡單之事。所有的文學活動都是以作家、作品及讀者大眾三方面為主軸，藉著一套兼有藝術、商業、技術各項特質進行繁複的傳播操作，這個傳播活

<sup>42</sup>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曹植，〈與楊德祖書〉，《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出版社，1979年），頁591-593。

<sup>43</sup> 晁謙之，〈花間集跋〉，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39-340。

<sup>44</sup> 秦少游《淮海詞》，宋刊可考者凡三種：一、乾道間杭郡所刊《淮海全集》之《淮海長短句》三卷本；二、南宋長沙所刊《百家詞》中之《淮海詞》；三、南宋某處所刊《琴趣外篇》中之《淮海琴趣》。葉恭綽，〈彙合宋本兩部重印淮海長短句序〉，同上註，頁53。

<sup>45</sup> 元·脫脫，《宋史》，頁3622。

動通常將身份特定的集群串連起來，形成一個交流圈<sup>46</sup>。以南宋詞選而言，當然也不例外。詞選的出版，往往得力於親友的資助，如黃昇於自序中曾言：「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sup>47</sup>此外，除了親友協助出版，促進詞選的流通外，書坊的贊助乃是南宋新興的文化現象。

南宋以來，出版業發達，閱讀人口增加，商賈積極投入文化事業，成爲有趣的文化的現象。熱鬧繁華之地，成爲文人雅士流連忘返之地；而經濟結構之改變，則促使商人地位提升。南宋書坊曾經刻過三部大型的詞籍叢刻，如錢塘書肆商人陳起刻有《典雅詞》取數十家詞集，南宋中葉福建書坊刻有《琴趣外篇》，嘉定年間，長沙劉氏書坊刻《百家詞》，得各家詞集九十餘種。然而，這些詞籍叢刻大多無處詢訪，亡佚散失日久，不過，其刻書規模之大，足以令人想見當時商人刻詞、選詞風氣之興盛<sup>48</sup>。

宋代書坊大量出現，大量出版詩詞文集，不僅直接參與選詞的工作，更擔負了文化傳播的使命。《草堂詩餘》則是書坊選詞當下的產物，陳振孫稱其爲「書坊編輯者」<sup>49</sup>，由於是書坊選詞，以「淺近通俗」爲原則，因此，選詞特別面向大衆，專注於市井間的消費流動態，銷售成績的好壞成爲編選者首要考量的因素。書賈爲投俗所好，因而精粗雜存，如：柳永〈八聲甘州〉：「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被譽爲「不減唐人高處」<sup>50</sup>，然《草堂詩餘》不選錄此作，而選其鄙薄之作，如〈玉女搖仙佩〉：「願嬾嬾、蘭心蕙性，枕前下言，表余深意。」又胡浩然〈東風齊著力〉（殘臘收寒）與〈送入我門來〉（茶壘安扉）二詞，亦收錄其中，蕭鵬則指出：「此作陳詞濫調，俗氣薰人，若非入樂傳唱，殆難流傳至今。」<sup>51</sup>《草堂詩餘》在編選之初，因具歌本、話本之性質，俾使傳唱廣遠，故寧棄高遠雅正之作；然亦因其淺近通俗，最爲貼切世俗大衆之心，故能流播廣遠。如龍沐勛所言：「獨《草堂詩餘》傳播最廣，翻刻最多，數百年來，幾於家絃

<sup>46</sup> 侯伯·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頁3。

<sup>47</sup> 黃昇，〈花庵詞選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59。

<sup>48</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32-33。

<sup>49</sup>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卷21，頁1300。南宋書坊所編選的詞選集，可考者有：《類分樂章》二十卷，《草堂詩餘》二卷，《群公詩餘前後編》二十二卷，《五大十曲》十六卷，《萬曲類編》十卷。

<sup>50</sup> 吳曾，《能改齋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25。

<sup>51</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144-145。

戶誦，雖類列凌亂，雅鄭雜陳，而在詞壇之勢力，反駕乎《花間》、《尊前》之上。<sup>52</sup>」《草堂詩餘》因飛馳百年，流遍人間，翻刻版本衆多，更關係著日後明代詞學之發展。

除了書坊選詞之外，詞社贊助者亦與南宋出版文化密不可分。南宋開始，文人集會結社的情況大為增加，〈西湖吟社〉即是典型之代表。於吟社活動中，分題賦曲，聯吟唱和，形成一種文學組織，《絕妙好詞》即是此機制運作下的產物。〈西湖吟社〉的組成份子以楊纘與張樞為主，其餘皆是詞壇一時之選<sup>53</sup>。張樞家世顯赫，根據《絕妙好詞箋》中所言：「張鎡，字功甫，號約齋，西秦人。循王諸孫，居臨安。官奉議郎，有《玉照堂詞》一卷。<sup>54</sup>」足見其地位不同於當時一般江湖文人。此外，張鎡官宦背景顯赫，由於門下自有一群文人食客，戴表元〈送張叔夏西游序〉云：「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子，皆鐘鳴鼎食，江湖才高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管穀其門。<sup>55</sup>」由此看來，姜白石與孫季蕃等人皆為張鎡門下的食客，張鎡則贊助其所撰寫的詩詞文章，如此一來，既可鞏固他們在詞社中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對於推動他們的詞學主張亦有所助益。

## （二）行銷策略與讀者意識

書籍商品化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商品的銷售問題，如何開發書籍的消費市場，乃是當務之急。南宋以來，在詞選集中附加詞評或註解，逐漸成為普遍的文學現象。此風由銅陽居士《復雅歌詞》首開其端，其中多錄詞本事，體例與詞林紀事相近。及至黃昇《花庵詞選》，發展出類似評點的批語，此類的批語，並非「單向」的論述，「對話」的意味頗為濃厚，藉著評點詞選集，一方面與作品、作者對話；另一方面，又同時與讀者對話。《花庵詞選》的批評方式，在當時是即有出版的因素考量，黃昇於自序中曾言：「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sup>56</sup>」這類輕薄短小的論述

<sup>52</sup> 龍沐勛，〈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63。

<sup>53</sup> 參見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7輯，頁88-101。

<sup>54</sup> 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收入《四部備要》集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1227。

<sup>55</sup> 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15。

<sup>56</sup> 黃昇，〈花庵詞選序〉，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59。

模式，適合閒賞的閱讀樂趣，同時也是商業社會中最能滿足大眾的書寫型態之一。

南宋以來，出版業的發達，書籍出版的種類極多，書本具有商品化的傾向，評點這種輕鬆簡易的批評方式，既可表達自己的文學理念，又可作為向書商宣傳書籍的手段，閱讀行為從原本的私密性變成公開的文學宣傳手段。在此風氣下，南宋註解名家詩集已成風氣，如傅幹《註坡詞》、曹鴻《註葉夢得琴趣外篇》、陳元龍《註片玉集》等，黃昇曾替魏慶之為序亦言：「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然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詩者能識其評之精。<sup>57</sup>」從中可見黃昇對於自己的自信與抱負，以善於為詩、精於評論者自居，這也充分表現在《花庵詞選》中<sup>58</sup>。平心而論，黃昇論詞較為抽象，缺乏理論深度與整體感。但我們同時也看到，在傳世的唐宋人詞選中，《花庵詞選》還是評點早期較好的一部書。其後的《草堂詩餘》、《陽春白雪》、《絕妙好詞》也都沿用這種體例<sup>59</sup>。這種情況至南宋後期愈趨成熟發展，到了劉辰翁，評點詩詞經常出現在原作的字裡行間，成為南宋評點的專家<sup>60</sup>。

另一方面，詞集評點既有商業的考量，「宣傳」與「行銷」就變得迫近而必要。胡德方序《花庵詞選》時曾云：

玉林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閒從吟詠自適。閣學受齋游公嘗稱其詩為晴空冰柱，閩帥秋房樓公聞其與魏菊莊為友，并以泉石清士目之。其人如此，其詞選可知矣<sup>61</sup>。

由此看來，處於南宋經濟發達的社會中，文學的宣傳與行銷並不侷限於書籍本身，其中還包括了「文學聲譽」的建構。《花庵詞選》敦請胡德方為序，希冀透過名家的推薦，以擡高自我的文學聲譽，成為當時文人圈中閃耀的明日之星；另一方面，更藉此機會向書商招手，希望自己所編的詞選集能夠榮

<sup>57</sup> 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序言。

<sup>58</sup> 《花庵詞選》評論詞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總論一代詞之特點，二是於作者之下評作者個人風格，三是於詞作下總評此詞，四是細論詞作中句意、章法等安排。相關的例子請參閱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158-160。

<sup>59</sup> 參見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批評形式與文化詮釋》，頁87。

<sup>60</sup>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329-427。

<sup>61</sup> 胡德方，〈花庵詞選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59。

登暢銷書籍之位。據此，況周頤亦持相同見解，「《花庵》間涉標榜」<sup>62</sup> 正是最佳的詮解。

文人重視聲名在南宋形成一種風尚，這與「干謁行卷」的方式，建構文學聲譽的風氣有關。《陽春白雪》編者趙聞禮，曾以詩卷干謁權貴程公許<sup>63</sup>，這與史達祖與張鎡的關係，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再者，這類具有文學行銷目的的言論，往往具有提升詞人聲望的效果。如仇遠〈玉田詞題詞〉中極力讚揚張炎詞作<sup>64</sup>；彭甘亭《小謨觴館集》有《徵刻宋人詞學四書啓》，稱《陽春白雪》與《樂府雅詞》斥哇去鄭，歸於雅音<sup>65</sup>。這類言論往往稱美多於批評，富於社交方面的意義，也成為展現人事風雅的一種交流活動。

此外，南宋詞選另一個文學推銷的手法，就是配合說唱藝人，以達商業目的之行銷<sup>66</sup>。既然以配合歌者為目的，就不能無視於讀者的反應，讀者的反應與書籍的推銷乃密不可分，根據姚斯的看法，文本必須經過讀者的參與才產生意義，所謂文學史就是一部文學作品的詮釋歷史，所關心的是現時的讀者與過去的作品兩種視野間辯證融合的接受效應<sup>67</sup>。讀者的作用主要在於主動參與並推動了文學創造的過程，賦予文學的發展以歷史的連續性，並提出各種意義的解說、作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sup>68</sup>。《草堂詩餘》則是書坊選詞當下的產物，與詞學商業行銷密切相關，是一本極為重視讀者反應之書籍。

《草堂詩餘》所選都是兩宋名家代表作，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說話人有時直接採擇其中名什用以演唱，有時變換句語，或更改作者姓名，將歌詞移入話本<sup>69</sup>，誠如宋翔鳳《樂府餘論》所言：

<sup>62</sup> 況周頤，〈夢園詞選序〉，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433。

<sup>63</sup> 「立之名聞禮，以聲氣相求，袖詩訪我，欲磨而未暇也。後數日，愜中所藏漢魏隋唐碑刻七十種相遺，且逐一題識所自得。特以長歌，辭義與字畫皆猶勁有英氣。自念好而莫能精鑑，習篆隸而未得活法，愧無以勝此兼金疊璧之贈，借韻以舒感臆。」程公許，《滄洲塵岳編》，卷六〈謝新胥口監徵趙立之〉序，《天津閣四庫全書》集部393別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76。

<sup>64</sup>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不特可寫青檀口，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人，當與百石老仙相鼓吹……予幼有此癖，老頗知難，然已有三數曲流傳朋友間，山歌村謠，是豈足與叔夏詞比哉。古人有言曰：『鉛汞交鍊而丹成，情景交鍊而詞成。』指迷妙訣，吾將從叔夏北面而求之。」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06。

<sup>65</sup> 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63。

<sup>66</sup> 參見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批評形式與文化詮釋》，頁93-94。

<sup>67</sup>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合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6。

<sup>68</sup>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37-341

<sup>69</sup> 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101。

《草堂》一集，蓋以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使隨時即景，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是此意。其中詞語，間與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觀之，適當一笑，而當時歌妓，則必需此也<sup>70</sup>。

宋翔鳳以「徵歌而設」與「歌妓娛客」二方面來說明《草堂詩餘》選詞的目的與編選特性，其選詞以「通俗」為首要考量，世俗化之意味頗為濃厚。據此，吳世昌〈草堂詩餘跋〉云：

《草堂詩餘》將名人詞分類編排，輒加副題，實為應此輩人(指唱詞者與說話人)需要而編，故雖為選集，而又名「詞話」，說話人得之，才高者可借此取徑，據以擬作。平庸之輩，亦可直採時人名作，以增加說話之興味。其為宋代說話人而編之專業手冊，非為詞人之選讀課本，昭然若揭。<sup>71</sup>

南宋註解名家詩集已成風氣，然而，詞選箋註為了說話人與歌者服務，此乃南宋新興的文學現象。世俗化的文類助長了讀者意識的興起，宋詞由於當眾演唱，尤其必須考慮讀者(聽者)的感受，誠如劉辰翁所言：「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sup>72</sup>」作者、讀者與批評者三者身份不同，感受也各有不同。在消費文化中，讀者是一個享樂的消費者，極具重要的地位，因此《草堂詩餘》的選詞更是結合大眾的需求，以商業目的為導向。有明一代，《草堂詩餘》為一大選本，各式各樣的翻刻本、增刪本、續補本，可謂盛況空前，《草堂詩餘》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讀物。難怪毛晉曾言：「宋元間詞林選本，幾屈百指，惟《草堂》一編飛馳。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附髀雀躍，幾至寒窗腐儒，挑燈閑看，亦未嘗欠伸魚睨，不知何以動人，一至此也！<sup>73</sup>」顯見《草堂詩餘》以說唱為宗，可為娛賓遣興之資，為通俗性之唱本。在此情況下，銷售成績的好壞成為編選者首要考量的因素，此乃為達商業目的而造就文學，「從大量作品裡頭揀選出他認為符合有限消費群所需求

<sup>70</sup> 宋翔鳳，《樂府餘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500。

<sup>71</sup> 吳世昌，〈《草堂詩餘》跋——兼論宋人詞集與話本之關係〉，收入《羅音室學術論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1年），第2卷，頁140。

<sup>72</sup> 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85。

<sup>73</sup> 毛晉：〈草堂詩餘跋〉，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頁393。

的作品」<sup>74</sup>，這也成為南宋詞選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 四、南宋詞選與文學生態

文學作品與作家所處的時代環境乃是不容分割的，《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於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sup>75</sup>」文學現象必須置於社會脈絡中，才能彰顯其意義。以下將南宋詞選置於當時之社會文化中，以「文學社群之推動」，「江山易主之文化衝擊」二方面進行討論，以建構南宋之文學生態，觀察此一時代的文化品味與社群網絡。

### （一）文學社群之推動

南宋開始，文人集會結社的情況大為增加，宋代詩文集中，屢見寄社之作<sup>76</sup>。《都城紀勝》中即記載南宋的社團組織<sup>77</sup>，其中尤以杭州西湖為最，成為多數文人探論文藝之地<sup>78</sup>。

南宋詞壇，也有結社填詞的出現，詞人於作品中常提及與「詞社」相關一詞。如周密〈采綠吟序〉言：「甲子（1264）夏，霞翁會吟社諸友逃暑於西湖之環碧。」、史達祖〈點絳脣序〉言：「六月十四夜，與社友泛湖過西陵橋，已子夜矣。」周紫芝〈千秋歲序〉言：「春欲去，二妙老人戲作長短句留之，為社中一笑。」當時文人社集之盛，自此可見一番。其中，南宋末年的「西湖吟社」即是典型之代表<sup>79</sup>。關於〈西湖吟社〉中成員考證與性質的問題，前人論述甚詳<sup>80</sup>，本文不再贅述。社員大都是當時著名的詞家，於吟社活動中，分題賦曲，聯吟唱和，形成一種文學組織；另一方面，他們互相往還，切磋學藝，提出共同的詞學主張，培養出共同的鑑賞品味。這不僅

<sup>74</sup> 侯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頁94。

<sup>75</sup>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8月），頁816。

<sup>76</sup> 參見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88-91。

<sup>77</sup> 耐得翁，《都城紀勝》，《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195地理類，頁747。

<sup>78</sup> 如耐得翁，《都城紀勝》言：「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同上註。

<sup>79</sup> 關於西湖吟社的論述，參見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7輯，頁88-101。歐陽光，〈南宋中後期在臨安西湖活動的諸詩社〉，收入《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54-272。

<sup>80</sup> 參見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7輯，頁88-101。程志媛，〈格律派後勁詞學批評的新詮釋——試以西湖吟社為例〉，收入《中極學刊》第1輯（2001年），暨南大學，頁95-116。

詳實記載著吟社的完整風貌，同時也映現了南宋的文學生態。

〈西湖吟社〉吟風鼎盛，文人雅士同聚一堂，實屬難得，參與盛會後，並且記錄社友的酬贈唱和之作。據此，周密〈瑞鶴仙〉、〈采綠吟〉中即有記載<sup>81</sup>，以具體呈現當時的活動風貌。除了社友間的唱和酬贈外，商榷音律乃是不可或缺的活動，強調詞的音樂功能，周密〈木蘭花慢〉序中就記載社友審音定律的文學活動<sup>82</sup>，吟社中重要人物如張樞、王沂孫等人皆為詞樂專家。他們有共同的師法對象與創作理念，選詞論詞，莫不以雅為宗，儼然成為南宋著名的詞學社群。

詞社聚會之實質意義，除了審音定律，彼此唱和外，往往伴隨酒宴歌舞，正所謂「鶯邊按譜，花前覓句」<sup>83</sup>或「倚桂分題，簪花籌酒」<sup>84</sup>，形成一種詩酒交流的文人雅聚，搭起一座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另一方面，也形成一個輻輳於西湖的文化網絡，呈現了流動開放的對話場域。這無形中凝聚了文學社群的力量，也得以透顯當時的文化品味，有助於南宋詞學網路的掌握與瞭解。

南宋文學社群興盛，已是不爭的事實，除了〈西湖吟社〉外，各行各業皆可名列詩社席中：

元佑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為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餘人不復能記。諸公多為平仄之學，似乎北方詩社……諸公篇章富有，皆曾編集……欲為詩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sup>85</sup>

可見當時唱和風氣之盛，結社風氣遍及社會，不僅文人有文學社群，質庫、

<sup>81</sup> 寄閑結吟臺，出花柳半空間，遠迎雙塔，下瞰六橋，標之曰「湖山繪幅」，霞翁領客落成之。初筵，翁俾余賦詞，主賓皆賞音。酒方行，寄閑出家姬侑尊，所歌則余所賦也。調閑婉而辭甚習，若素能之者。坐客驚詫敏妙，為之盡醉。越日過之，則已大書刻之危棟間矣。〈瑞鶴仙序〉甲子（1264）夏，霞翁會吟社諸友逃暑於西湖之環碧。琴尊筆硯，短葛紉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間。舞影歌塵，遠謝耳目。酒酣，採蓮葉，探題賦詞。余得塞垣春，翁為翻譜數字，短簫案之，音極諧婉，因易今名云。〈采綠吟序〉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276、3270。

<sup>82</sup> 西湖十景尚矣。張成子嘗賦〈應天長〉十闕誇余曰：「是古今詞家未能道者。」余時少年氣銳，謂：「此人間景，余與子皆人間人。子能道，余願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詞成。成子驚賞敏妙，許放出一頭地。異日霞翁問之曰：「語麗矣，如律未協何？」遂相與訂正，閱數月而後定。是知詞不難作，而難於改；語不難工，而難於協。唐圭璋編，《全宋詞》，頁3264。

<sup>83</sup> 周密，〈水龍吟〉，唐圭璋編，《全宋詞》，頁3286。

<sup>84</sup> 周密，〈醉江月〉，唐圭璋編，《全宋詞》，頁3286。

<sup>85</sup> 吳可，《藏海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341。



酒肆之人也都名列詩社之席，可見當時社會中蓬勃發展的文學社群。此外，這些唱和之作，往往集結成冊，使之得以廣泛傳播，經由寫詩結社的社交行為，不僅深化社友之間的情誼，同時也標誌宋代文化蓬勃發展的積極意義。

周密的《絕妙好詞》，即是此文學社群氛圍下之產物，其中收錄風格相近的作家作品，其中除了周密本人選錄二十二首外，吳文英與姜夔分別以十六首與十三首位居二、三名之位，其他的吟社成員如張炎、王沂孫、陳允平、楊纘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選錄其中。由此看來，《絕妙好詞》的編選，與其詞學觀念應有吻合之處，若將此書與張炎《詞源》相互參照，可以發現：《詞源》所舉南宋諸家之例，大都收在《絕妙好詞》中。據此，蕭鵬指出，《絕妙好詞》是應社需要而產生的詞選<sup>86</sup>。此言甚是，張炎《詞源》可說是〈西湖吟社〉共同的理論主張；楊纘〈作詞五要〉可說是指導寫作的最佳範本；周密《絕妙好詞》則是徹底結合「理論」與「實際創作」的結晶品，不僅宣揚其詞學理念，同時也是結社唱和風氣下的最佳代言。

綜觀《絕妙好詞》全書，雖然少許宋末詞人之佳作未能選取，誠如陳廷焯所言：「草窗《絕妙好詞》之選並不能強人意，當是局於一時所聞，即行採入，未窺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輯，一概尊之。<sup>87</sup>」然此亦無礙其價值，基於個人性情與氣度的差異，編選者學養與識鑒的不同，致使選本各具旨趣，此乃情理中事。更何況周密《絕妙好詞》選本在詞學上的貢獻，在於他選錄了許多不見史傳的詞人作品，使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這派詞流行的情況<sup>88</sup>。因此，說它是典雅詞派的代表選集，亦無不可；而且，日後清代的浙西詞派，即延續此一理念，建構出脈絡更為分明的詞學理論。

## （二）江山易主之文化衝擊

《樂府補題》是一部最早的詠物詞集，據元人墓誌銘所載，這部詞集是臨安詞人群中陳恕可所編。它是宋室陵替之後，五次分題聚會活動的作品，並於詞作前註明活動地點、賦題名稱與調名。據此，周濟曾言：「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

<sup>86</sup>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195。

<sup>87</sup>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3807。

<sup>88</sup> 詹安泰，〈從宋人的五部詞選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收入《詹安泰詞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19。

〈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sup>89</sup>」由此看來，《樂府補題》顯然是文學社群聚會活動下的產物，同時也是最早的課社詞選。其中收錄的作品，皆是社友之作，全書著錄詞人十四家，計五題，存詞三十七首。五次聚會中，活動的地點分別在宛委山房、浮翠山房、紫雲山房、餘閒書院、天柱山房。每次吟唱的山房、書院主人皆未曾參與賦詞，可能是身為主人者，必須主其事並擔任評論審定的工作，也就無法、也不便參與創作。

五次聚會地點不同，時間亦相異，龍涎香以冬春為主，白蓮為夏末秋初，蟬為秋季，蓴、蟹則應在深秋。《樂府補題》諸詠，絕非泛泛之作，誠如蕭鵬所言：「這部奇書，無論從它的形式來看，還是以它的內容來看，都不會是泛泛之作，沒有任何寄託的詠物詞。<sup>90</sup>」《樂府補題》正是南宋借詠物以求寄託之典型，其格調騷雅幽怨，隱寓深邃；個人的家國之悲與身世之感，僅能隱約其辭，假諸物類以出之。陳廷焯亦言：「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sup>91</sup>，此說自有其道理所在，南宋山河破碎之際，知識份子感到強烈的銅駝之恨及亡國之痛，《樂府補題》正是具體呈現家國之思和遺民之恨的時代產物。

《樂府補題》為詞社唱和之作，與南宋詞社的活動有一脈相承的關係，然而，江山易主，朝代更替，國破家亡的哀思，流離失所的悲涼，流蕩在其作品中，組成了一曲淒愴悲涼的鼎革哀響，又使它與南宋中後期尚雅的風氣有所不同。詹安泰論寄託一文說：「及至南宋，則國勢陵夷，金元繼迫，憂時之士悲憤交集，隨時隨地，不遑寧處；而時主昏庸，權奸當道，每一命筆動遭大謬，逐客放臣，項背相望，雖卻不掩抑其辭，不可得矣。故詞至南宋最多寄託，寄託亦最深婉。<sup>92</sup>」由此看來，宋末由於時局的動蕩，其所寄託範圍，已從個人身世之感擴展至黍離麥秀之悲，而感時傷事更為深遙委曲，寄託與詠物兩者之關係更為密切。作為一部遺民詞人的詠物詞集，《樂府補題》藉著不同的物象，以傳達黍離之嘆，或是歷史世變的深沉省思；不僅深具豐厚的思想內涵，也使南宋詠物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就。

《樂府補題》雖然是結社分題賦詠，但絕非無謂的應社之作，繁華不再

<sup>89</sup>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29。

<sup>90</sup> 蕭鵬，〈樂府補題寄託發疑〉，《文學遺產》第1期（1985年），頁71。

<sup>91</sup>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3809。

<sup>92</sup> 詹安泰，〈論寄託〉，收入《詹安泰詞學論集》，頁222。

的哀嘆，盛衰無常的吶喊，遠比南宋的詩酒風流多了一份歷史的滄桑。不過，遺憾的是，《樂府補題》在元、明時期沈湮不傳，直至被朱彝尊、汪森等詞人發現，由蔣景祈出資刊刻，才重新得以問世<sup>93</sup>。據此，曾有論者指出：

《樂府補題》一卷，常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版已傳。……幸而是編僅存，不為覃蝕鼠啣，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sup>94</sup>

《樂府補題》的重新問世，引起詞壇的熱烈迴響；其詠物之餘響，更在後代引起一陣騷動，視為詠物詞之寫作典範<sup>95</sup>。清醇雅正的審美風格遍受文人之喜愛，如徐喈鳳的《蔭綠軒詞》與曹亮武的《南耕詞》等，都有擬《樂府補題》之作；自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間，詞人們群起擬作，一時為《後補題》而相唱和者，有近百家之多。陽羨派蔣景祈〈刻瑤華集述〉亦言：「得《樂府補題》，而輦下諸公之詞體一變。繼此復擬作《後補題》，益見洞筋擢髓之力。<sup>96</sup>」可見《樂府補題》的流傳，不僅透顯了宋末江山易主的時代氛圍；其以詠物喟嘆故國之思的寫作方式，也成為後來表現詞人心靈淒愴悲涼的文學形式。

## 五、結語：「南宋詞選」之文化意涵

本文將「南宋詞選」置於傳播的脈絡下重新思考，「南宋詞選」顯然於傳統的文學批評外，開展出一條可以詮解當時南宋之文學生態與文化內涵。

宋代雕版印刷，印刷術的普遍應用，書籍量產之後，它不再是少數人的專業用品，與商品經濟相互結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間接造就了宋代詞

<sup>93</sup> 參見蘇淑芬，〈論蔣景祈對詞壇的貢獻〉，《東吳中文學報》第11期（2005年），頁221-256。

<sup>94</sup>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36，頁304-305。

<sup>95</sup> 如乾嘉間王昶〈江賓谷梅鶴詞序〉云：「暨於張氏炎、王沂孫、故國遺民，哀時感事，緣情賦物，以寫閔周哀郢之思，而詞之能事畢矣。」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卷7，頁3415。吳錫麟〈仿樂府補題唱和詞序〉云：「在昔詞人，遭逢末造，撫銅駝而泣下，驚白雁之飛來。滄海波荒，冬青樹冷。殘水賸水，摹圖畫而難工；斷井頽垣，覓鈿釵而不見。濁人必笑，秋士能悲。離黍之思既深，夢梁之感斯託。」王昶，《春融堂集》（嘉慶十二、三年·塾南書舍刊本），卷41，頁4。

<sup>96</sup> 蔣景祈，〈刻瑤華集述〉，《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8。

學的繁榮。「詞選」乃是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南宋以後，詞選逐漸轉為讀本，造成了「消費對象的轉移」，選詞的工作主要是樂工與說唱藝人，接受對象可以是一般市井小民，也可以是文人雅士；一旦宋詞變成書面傳播，文人雅士成為特定的接受者，讀者群產生明顯的位移作用。隨著詞作消費對象的轉移，選詞型態已逐漸轉變，走向南宋詞壇「尚雅」的文學觀念，開啓了宋人詞選的另一個新境界。

出版文化與南宋詞選的對應關係上，南宋以來，在詞選集中附加詞評或註解，逐漸成為普遍的文學現象，這種情況至南宋後期愈趨成熟發展，到了劉辰翁集大成，成為南宋評點的專家。南宋文人註解詞選集的目的，無論是為了傳達自我的詞學觀點，或是想要促進該選本的流通，都與「傳播」密不可分。評論的方式，並非以專著的形式呈現，而是簡短扼要的論述方式，評論者一方面與作品、作者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又同時面對讀者，於無形中傳述自己的詞學理念。評點既可表達自我的文學理念，又可作為傳遞給社會大眾的媒介之一，評點於是成為一種傳播手法，由私人的文學閱讀轉變為向眾人展示的書寫行為。

閱讀行為從原本的私密性變成公開的文學宣傳手段，在此風氣下，文學的宣傳與行銷並不侷限於書籍本身，其中還包括了「文學聲譽」的建構。希冀透過名家的推薦，以擡高自我的文學聲譽，成為當時文人圈中閃耀的明日之星；另一方面，更藉此機會向書商招手，希望自己所編的詞選集能夠榮登暢銷書籍之位。《草堂詩餘》則是書坊選詞當下的產物，與詞學商業行銷密切相關，為了說唱藝人而服務，世俗化之意味頗為濃厚；正因為是世俗化的文類，也助長了讀者意識的興起，宋詞由於當眾演唱，尤其必須考慮讀者的感受，這也成為南宋詞選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南宋以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詩社勃興，結社唱和，蔚然其盛，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生態，《絕妙好詞》與《樂府補題》皆是此環境下之產物。周密等人組成〈西湖吟社〉，分題賦曲，審音定律，更是一種詩酒交流的文人雅聚，映現了南宋詞學與文化之一隅。周密《絕妙好詞》則是徹底結合「理論」與「實際創作」的結晶品，不僅宣揚其詞學理念，同時也是結社唱和風氣下的最佳代言。《樂府補題》則不然，它的五次聯詠，既是文學活動，同時也是政治活動；於宋室陵替後，相互傾訴山河破碎之悲涼，

遠比南宋的詩酒風流多了一份歷史的承擔與世變的滄桑。其深遙委曲的詠物筆法，也成為後來表現詞人心靈淒愴悲涼的寫作典範。

南宋以來，文人編選詞集之作蔚然其盛，將詞選集置於傳播與閱讀消費的脈絡下，有助於瞭解當時文學生態與其文化機制。詞選集中無論是作品的探究、詞人與詞作典範的確立，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等有待懸解的問題，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參與，也期待日後的專文討論。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1. 五代·趙崇祚編，湯顯祖評，劉崇德、徐文德點校，《花間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
2. 宋·《尊前集》，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宋·《金奩集》，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4. 宋·孟元老，《東京孟華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
6. 宋·黃大輿，《梅苑》，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7. 宋·曾慥，《樂府雅詞》，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8. 宋·何士信箋註，《草堂詩餘》，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9. 宋·黃昇，《花庵詞選》，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0. 宋·趙聞禮，《陽春白雪》，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1. 宋·周密，《絕妙好詞》，唐圭璋、蔣哲倫、王兆鵬等人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 宋·周密，《武林舊事》，《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 195 地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3.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 195 地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4. 宋·吳自牧，《夢梁錄》，《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 195 地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5. 宋·陳恕可輯，《樂府補題》，《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 498 詞曲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6.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17.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18. 清·王昶，《春融堂集》，嘉慶十二、三年，塾南書舍刊本。
19. 清·蔣景祈，《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 二、近人論著

1. 戈德曼著，吳岳添譯，《論小說的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2. 方智範等著，《中國詞學批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3.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4. 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5. 王兆鵬，《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 王兆鵬，〈歌妓唱詞及其影響——宋詞的口頭傳播方式研究〉，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
7. 王兆鵬，《唐宋詞史的還原與建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任二北，〈研究詞集之方法〉，《東方雜誌》第 25 卷 9 號，1928 年。
9.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吳世昌，〈《草堂詩餘》跋——兼論宋人詞集與話本之關係〉，收入《羅音室學術論著》第 2 卷詞學論叢，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1 年。

11.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12. 沈家莊，《宋詞的文化定位》，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 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
14. 李劍亮，《唐宋詞與唐宋歌妓制度修訂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15. 李劍亮，《宋詞詮釋學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16. 舍之，〈歷代詞選集敘錄〉，收入《詞學》第2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17. 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18. 周彥文，〈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收入《文學與傳播的關係》，臺北：學書書局，1995年。
19. 尙學鋒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21. 姚斯、霍拉勃合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22.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
23. 韋勒克（Rene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合著，王夢鷗、許國橫譯，《文學論》，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
24.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5.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6.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27. 孫克強，《詞學論考》，天津：延邊大學出版社，2001年。
28. 黃文吉，〈宋代歌妓繁盛對詞體的影響〉，收入《第一屆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
29.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

- 年。
30. 張惠民，《宋代詞學資料匯編》，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
  31. 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的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32. 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
  33.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
  34. 陳文忠，《文學美學與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35. 郭鋒，《南宋江湖詞派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4年。
  36. 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批評形式與文化詮釋》，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37. 程志媛，〈格律派後勁詞學批評的新詮釋——試以西湖吟社為例〉，收入《中極學刊》第1輯，南投：國立暨南大學，2001年。
  38. 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麗文文化公司出版，1996年。
  39.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彰師大國文學誌》第3期，1999年。
  40. 楊雨，〈略論歌妓文化與詞的興起和傳播〉，收入《詞學》第1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41. 詹安泰，〈從宋人的五部詞選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收入《詹安泰詞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
  42. 詹安泰，〈論寄託〉，收入《詹安泰詞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
  43. 趙曉嵐，《姜夔與南宋文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44. 歐陽光，〈南宋中後期在臨安西湖活動的諸詩社〉，《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45. 蔡鎮楚，《宋詞文化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6. 蔡鎮楚，《唐宋詩詞文化解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47. 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48. 劉少雄，〈草堂詩餘的版本、性質與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第 5 輯，1991 年。
49. 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 年。
50. 劉尊明，《唐宋詞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51. 劉貴華，《古代詞學理論的建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年。
52. 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53. 蕭鵬，〈樂府補題寄託發疑〉，《文學遺產》第 1 期，1985 年。
54. 蕭鵬，〈西湖吟社考〉，收入《詞學》第 7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5. 蕭鵬，〈趙聞禮陽春白雪版本考述〉，《文學遺產》第 1 期，1991 年。
56.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57. 龍沐勛，〈選詞標準論〉，收入《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58.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9.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四川：巴蜀書社，2002 年。
60. 蘇淑芬，〈論蔣景祈對詞壇的貢獻〉，《東吳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5 年。

# Communication, Publication and Marketing — A Cultural Study on Anthologie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Ci* Poetry

Lee, Te-wei\*

##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pplie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o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y examining the anthologies of *ci* poetry published and circulated at the time. First, based on the idea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shift of objects for consumption,” I delineate the communication background of the anthologies. Second, I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nthologi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publication culture” and “ecology of literature.” With regard to publication culture, I consider aspects of “publisher and sponsor” and “marketing strategy and reader consciousness” to elucidate relationships among commentators, readers, and texts. From there, I study the consumption tendency of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 also study “the enhancement of literary community” and “the cultural impact of dynastic chang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field map for the contemporary ecology of literatu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anthologies of *ci* poetr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anthologie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ci* poetry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ci* poetry criticism  
literature community publication culture

---

\*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